

中日启蒙文学论

何德功 著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中日启蒙文学论

责任编辑：黄金山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启蒙文学论/何德功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1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ISBN 7-5060-0555-7

I. 中…

II. 何…

III. 启蒙文学—对比研究—中、日

IV. I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599 号

中日启蒙文学论

ZHONGRI QIMENG WEN XUE LUN

何德功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2500 册

ISBN 7-5060-0555-7/I·16 定价: 9.00 元

序

林 非

德功的博士论文《中日启蒙文学论》即将付梓问世，嘱我撰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允了他的要求。

记得在几年之前，他撰写这部论稿时，我曾仔细地阅读过两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去日本进行研究的收获是很大的，通过自己刻苦和勤奋地钻研，搜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这就是出现在论著中有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文学思潮的演变情况，给予这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可以让他们很好地开阔视野，作出进一步的思索。

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功能够在这样广博的基础上，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充满逻辑力量的辨析，说得头头是道，有不少透辟的见解。只要是认真地读过这部论稿，就不仅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学思潮，以及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深受前者影响的轨迹都有着充分的了解；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世界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主潮，给予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广泛影响，也有着确切和深入的认识。这就使得他的这部论著，能够在整个世界宏观的文化气氛笼罩底下，描绘出了

中日两国近代文学思潮发展的趋势和轮廓，甚至还扩大到细腻地描述出不少代表性作家的审美情趣，从而就既是带上了文化史与文学史的风貌，却有着比较文学研究和作家论的图景，真是丰富多采，条分缕析，给予读者的启迪无疑是多种多样的。

从中日两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这个阶段的比较研究而言，他一一考察了日本当时的政治小说、诗歌和散文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文学主张，对于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的影响；坪内逍遙、森鸥外等作家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早年文学思想的影响；“白桦派”对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主张的影响等等。他还进一步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它们相互之间各自的异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前者对于后者的种种影响，实在是分析得鞭辟入里，精采纷呈，可以说是全书最为趣味盎然的部分。在我所读到过的有关论著中间，这可以说是分析和阐述得最为详尽和系统的一种，比起这个领域中过去的研究成果来，无疑是有了明显的前进，实在是一个可喜和值得祝贺的收获。

这部论著涉及的方面确实是相当多的，并且还都发表了自己独创性的见解，这是很令人欣慰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品质是必须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正是这些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独创见解，就既显示出研究者科学探讨的理论勇气，又标志着研究者所达到的学术水准。不过正因为是独创性的见解，它就不可能完全都被认同，而必须通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以便证明自己的准确性究竟如何？我迫切地希望在这部论著出版之后，能够引起切磋和讨论，在这样反复地论辩中间，就可以更好地评价作者的种种见解。在经过这样的切磋和讨论之后，不管有关的研究家是否都同意德功的主张，却都会在此种触发底下作出更为深入的思索，此种触发作用正是提高学术水准的重要途径和保证。

从这部论著的全部逻辑推理过程中间，可以充分看出德功广

泛地吸收了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不少新颖和具有理性主义光芒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在这样视野开阔的广博基础上面，同时也显出他正在创造性地掌握和运用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而就保证了这部论著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学术性，这确乎是一位年轻学者所路上的可喜的治学之路。

这部论著的文字也显得清晰流畅，没有时下某些论文那种食洋不化的诘屈聱牙之感，这大概是深受晚清以来不少启蒙主义大师极力主张语言必须畅通动人的影响。德功所撰写的不少段落中间，在探讨到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前景与命运时，甚至还常常闪烁出感情的火花来。这是因为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是否能够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却又勇敢豪迈地面向世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从而促进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迅速地趋于现代文明，而这又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国家，能否建成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作为一个对自己民族抱有神圣责任感和怀着满腔热忱的学者，怎么能不为此而在内心深处迸发出汹涌澎湃的情感呢？

德功这部论著藉以进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许多资料，都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去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了一个学年的收获。他得到过那儿好几位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因此这部论著无疑可以视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中日两国学者深厚友谊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1994年11月11日于北京

绪 论

据地质学家认为，很久很久以前，亚洲东南部南洋群岛与澳洲是一个大陆，中国东部和朝鲜、日本也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海水冲断，形成了澳洲、南洋诸岛、日本与亚洲东部毗连的地方，因地壳变动陷落，成了日本海，遂和大陆隔断。这种近似于神话的科学推断颇有意昧，它调动起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穿越时间隧道在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中漫游，领略大自然的神奇悠久，叹息人生的短暂的同时，了解中日两个民族的渊源关系。笔者无意考查这种结论到底有多少根据，因为这是地质学家的事情，只是想说，从直观上愿意接受这种判断。且不说从外表来看，中国人与日本人很难分辨，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有明显的亲和感。目前所能知道的日本文化，都是接受大陆文化以后的文化，严格说来，跟朝鲜、安南一样，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即使在日本近代转而学习西方文化以后，中国的儒家文化虽在故土屡次受到冲击和批判，被先进的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们视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阻碍，而在日本还是受到相当的尊敬，井上靖先生的历史小说《孔子》因日本读者的厚爱而成为畅销书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日本无论怎样在政治、经济上与西方国家有着怎样难以分离的紧密关系，无论怎样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化，但在人们心目中，它仍然具有东方文化

的特点。

也许正是因为地理环境的相近形成文化互相交流的方便条件，进而产生相近的文化，也许是因为人种相同在血缘关系上有亲和感，总之，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十分繁频，这一现象的存在，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探求其存在的理由。

中日文化交流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其特点是中国单向地输出和日本全面地引进。一方在文化方面慷慨地奉献，而不想从接受对象索求什么，一方竭尽全力学习和模仿，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不同于以物易物的贸易，没有斤斤计较，也不会引起人们不平的感觉，施授的一方似乎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翁，领取的一方近似于永不满足的贪婪的索取者，施授者的最大的报酬是广泛传播自己的文化以达到文化价值的实现，领受者最大的收益是较大程度上对异文化的融合和应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主要扮演施授者的角色，与此相反，日本则主要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大量的营养，融进自己的文化，因而是文化交流中的领受者。从社会制度方面看，日本最古的政治教化指导方针，推古帝十二年（公元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融合了佛儒及法家学说；在日本政治史上和明治维新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是模仿中国唐代的典章制度；如罢私有庄田，行班田制，选户籍，修京师官署、郡国驿站等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在宗教方面，所有佛教的各种经典、各种宗派无不传入日本。从隋唐到宋元明，日本到中国留学的和尚络绎不绝，中国第一流的名僧也有不少到日本布法，在入唐的名僧里有道昭、道慈、玄昉、圆行、最澄、圆仁，入宋名僧里俊苾（大兴止法国师）、荣西（千光法师）、道元（承阳大师）等人；由

华赴日的僧侣，以鉴真、祖元、隱元等人的影响为最大，其中唐扬州龙兴寺名僧鉴真于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唐天宝十三载）渡日，僧徒24人，在奈良东大寺建立了戒坛院，天平宝字三年又创建唐招提寺，东大寺被确立为日本佛教总本山的权威，即由鉴真开始。在文学方面，最古的《古事记》、《日本书记》里的神话传说就有不少中国神话传说的成分，《昭明文选》曾为古代日本士子必读书类。最早的和歌《万叶集》，模仿了我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借鉴了我国的五七言诗，日本最有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桐壶卷就是从《长恨歌》得到意匠。至于各种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在日本影响就更大，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即使在大量加杂外来语的今天，汉字与汉语仍占据日本语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比重。

明治维新以后，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特点是中日两国文化的互为渗透，但以中国学习和输入日本文化和以日本为中介吸收西方文化为主，在政治方面，我们有学习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在文化方面，从中国近代的晚清文学改良到30年代的左联文学都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从1896年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带留学生唐宝锷等13人赴日起，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42年中，公私赴日留学生达5万多人，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日本留学生，产生不出现在的光辉中国。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也印证着中日两国民族兴衰的演变，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化曾有怎样光辉的过去，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恩惠应该说是中国的骄傲，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文化转而学习日本文化或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已失去优势的地位，日本近代文化在模仿和融合西洋文化之后，反超了中国文化。我们

必须在正视中日文化地位逆转的客观现象的基础上，探索在那对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仅仅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腾飞却是关键的时刻，中国文化的优势怎样在不知不觉间消失，日本文化怎样由低势文化一跃而为高势文化的原因，在不无痛苦的历史回顾中，去总结经验和记取教训。

人类历史到了 19 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世界的空间似乎在不断地缩小，广袤无垠的大海不再是只有冒险家才能逾越的障碍，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有着同病相怜的命运，即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在这一矛盾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前者占据主导的支配的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中日两国封建主义体制注定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要么变封建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跻身于强国之列，要么继续坚持封建主义制度，在落后挨打的困境中对强大的资本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死守愈来愈小的封建主义地盘。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学习处于高势文化地位的西方文化，中日两国在意欲改变自己民族的落后地位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高势文化西方文化面前，事实上也都有开放的举动，遗憾的是在效果上相差甚远，日本一跃而起，在列强中成为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后起之秀，中国则像“睡狮”一样很长时间内，任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蹂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为什么会有这样显著的差异？这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我认为中日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不能不说是根本原因之一。西方文化的传入在早期中国优越于日本，早在 16 世纪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文化交流方面就把中国作为主要对象，日本只是他们到达中国经由的驻足点和中转站。就传教而言，明治初期，有据可查

的主要活动于日本的传教士仅有 6 人，而中国仅据王韬在《泰西著述考》中的记载，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至康熙十二年（1674 年）的 120 年中间，到中国传教的著名教士，就有 92 人之多。令人遗憾的是，传教士虽然努力将西洋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成效却不与他们的努力成正比，这可能与中国固有文化水平较高，一般士大夫存在着高傲自大心理，固守着高水平的传统文化，不屑于向蛮邦的西方文化学习有关，所以传教士们传播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直到十八、九世纪，也仍未能普及。日本闭关自守，蔑视西方文化，轻视外国人的情况曾与中国相似，然而到了嘉永五年（1852 年），日本开始大量由汉译书刊吸收近代西洋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欧派遣使者、留学生直接输入西洋文化。与中国不同的是，近代西洋文化的出版在中国大多出于传教士之手，对中国昏聩无能、高傲自大的统治者，对固守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的人民大众不起什么作用，没有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中去；而在日本，西方文化不但渗透进日本人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消化之后创立日本新文化的基础，而且还应用到生活、习惯等方面。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很少有变动的大陆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民不求知道外面的世界，因此，人们很少对现有制度怀疑，并加以改革，在外来文化和新事物面前，很容易麻木和迟钝，加上中国人的自己文化的优越感，排斥西方文化是十分自然的事；日本因为四面临水，贫乏的资源迫使日本人经常要在海上劳作，加上自身没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文化，很容易吸取别国的先进文化，因而一旦发现西方文化优于他们学习的中国文化之后，很容易抛弃原来学习的榜样，转向新的目标，这种善于模仿和学习的日本民族的性格，使日本的现代化受益非浅，中国民族性格中某些保守的因素则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

伐。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发生了逆转，中国要改变自己的落后地位，不能不向日本学习，由于日本离中国较近，中国也不能不通过成功的日本输入西方的先进文明，中国近代文学的启蒙思潮对日本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正是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政治和经济上向日本学习互相映衬，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研究它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变化的心态，当然，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也是极有意义的。

目 录

序	林 非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的启蒙和日本的启蒙	(1)
第二章 日本政治小说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56)
第三章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日本明治文坛	(94)
第四章 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的影响	(112)
第五章 “人的文学”与日本的白桦派	(127)
第六章 私小说与自我觉醒	(157)
第七章 鲁迅与日本私小说	(193)
第八章 郁达夫与私小说	(235)
后 记	(254)
参考书目	(257)

中国的启蒙和日本的启蒙

从一般意义上说来，启蒙运动是从思想上清扫封建社会造成的蒙昧无知，启发理智，由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

欧洲的启蒙运动始于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4至16世纪。中世纪是欧洲历史最黑暗的时期，罗马天主教会把整个西欧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制度体系，一切以神学和宗教为中心，政治体制由神的代言人教皇支配，意识形态由神学来统治，哲学、文学等各种学科也只是从不同角度注释神学。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还竭力贬低人的地位，主张人应该抛弃一切尘世间的欲望，把一切奉献给神灵，这样人死后灵魂才可能升入虚幻的天堂。显然，无论抬高神的地位或是贬低人的价值，都是以封建迷信的宣传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为基础的。因此，与之相对的科学和知识必然成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死敌，一切先进的思想和新的发现都会被斥为“异端邪说”，思想家和科学家本人也因之受到严酷的处罚。文艺复兴即是先进的思想家针对黑暗中世纪的现状，借助古希腊文明的阴魂建设资产阶级文明的文化运动，它与宗教神学针锋相对，高高举起人文主义旗帜，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要求重视现实生活，重视物质享受，要求发展人的个性，把

人的思想和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文学领域“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大人物”但丁的《神曲》，大胆地抨击了教皇和僧侣的丑恶行径。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欧洲各国纷纷出现张扬人的个性、赞美人、肯定人的欲望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作者如莎士比亚、薄加丘等也因之彪炳史册。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他的理性，因此，对人的肯定与歌颂必然带来人的理性探索的结果——科学的繁荣。因而，在人文主义文化的基础上，近代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兴起，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①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廓清了人们的视野，进而对封建迷信和神权又是一种严肃的挑战，它与人文主义文化一起，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互相带动，共同前进，带来了璀璨的欧洲文明。

继文艺复兴之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次运动以“天赋人权”为旗帜，在人文主义肯定和歌颂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人人生来自由、平等，打破了君权至上的迷信。同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对于打破迷信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它对封建制度加以剖析，把王公贵族奢侈淫逸和黎民百姓则转辗于饥饿之中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归结于不平等的制度，从而促使新兴的市民阶级很快地猛省，奋起打破以王公贵族为本位的不合理的社会，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作过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3页。

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

—

日本的启蒙运动有着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日本从封建主义国家跃进资本主义行列的转折点，但这场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经过长时期的启蒙人民群众从封建愚昧中觉醒之后，在成熟而强大的资产阶级领导下，从王公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当时有受兰学的影响、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主张富国强兵的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武士阶层领导幕末的倒幕运动，但毕竟在明治维新以前缺少大规模的用西方先进思想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是在被迫“开国”，人们看到软弱的幕府无法领导日本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进而变攘夷为倒幕，挟持天皇、实行明治维新的。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为了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启蒙。明治政府适应这种社会需要，采取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象势不可挡的潮水一样涌进日本列岛。当时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首先担当起传播“理想之光”的历史使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57页。

福泽谕吉出身于中津藩的下级武士家庭，少年时代学经、史、《左传》，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开国以后，学“兰学”，在幕府灭亡之前，曾三度周游欧美各国，亲眼看到英、法、德、俄、西、葡、美等各国的实际情况，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坚信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日本才能真正地富国强兵，他的《西洋事情》以自己游历欧美的亲身体验，在参考西方典籍的基础上，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在日本深受人们的欢迎。他的《劝学篇》，从天赋人权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封建的等级观念，认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①，他号召人们要独立自主，认为只有每个人充分独立，国家才能保持完全的独立。因此，从希望国家的独立这一点看，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从提倡个人独立来看，他又是一个提倡个性解放的先驱。而个人独立的最大原动力又是金钱。他认为人们必须尊重金钱，无论有多么出色的才能和技艺，如果不能获得足以保持自己生存的金钱，就不能说是独立的人，从而把以金钱观念为中心的商品意识最先植根于日本，对长期以来顶戴以刀为大和魂的武士的余弊和自古以来轻视金钱的观念是一种猛烈的冲击。同时，他是新式学校的开创者，今日的日本著名的庆应义塾学校就是由他创办的，他是使一切文明的种子在日本萌生，类似于百科全书家的天才、杰出教育家、文明批评家、优秀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实业家和记者。福泽谕吉的文风追求平易，草稿一写出他就先读给下女听，不懂之处加以删改。

然而，尽管如此，他作为思想界的先驱，经常有不被人理解的悲哀，他的近似于小说的寓言故事《癡女》就反映了这种内心体验。

①《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